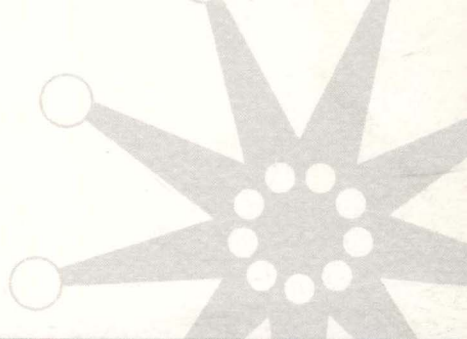


朱宗震 著



辛亥革命

百年祭

中国现代化的拓荒运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宗震 著

辛亥革命 百年祭

中国现代化的拓荒运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百年祭:中国现代化的拓荒运动/朱宗震
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

ISBN 978 - 7 - 5325 - 6162 - 9

I. ①辛… II. ①朱… III. ①辛亥革命—研究
IV. ①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2835 号

辛亥革命百年祭

——中国现代化的拓荒运动

朱宗震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257,000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978 - 7 - 5325 - 6162 - 9

K · 1461 定价:4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金冲及

辛亥革命研究三十年来的成果,用“空前繁荣”四个字来形容大概不算夸张,它在中国史学领域内是相当突出的。这三十年中,每隔十年相继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80、90周年的大型学术讨论会,有众多海内外学者参加,成为史学界公认的学术盛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所编上世纪八十年代《辛亥革命史论文索引》,收录这十年间发表的论文篇目有2400多篇。又据《辛亥革命研究动态》统计,九十年代在这方面发表的论文约4400篇。这些年出版了数以百计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和研究著作,台湾、香港等地的研究工作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成果不仅表现在数量方面,辛亥革命研究达到的深度同样有目共睹:对这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全过程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和细化;与此同时,研究领域和视野越来越宽广,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经济、海内外立宪派的活动、清朝统治集团的状况、西方列强的对华态度、以及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变化产生的深远影响等研究,都取得相当的成果。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被引入这个领域。

那么,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当然不是。

要把辛亥革命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嬗变的大背景下考察

怎样把辛亥革命研究继续推向前进?我粗浅的想法,需要更深入地把

辛亥革命放在近代中国,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嬗变的宏大背景下来考察。也可以说,研究对象不只是这场革命运动的历史,而且应该包括辛亥革命时期整个中国的历史。

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剧烈转型期,处在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变中,经历了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濒临灭亡走向重创辉煌的历程。这个过程决非一步就能达到,而是有起有伏,在曲折中顽强前进。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指出:在二十世纪中国起起伏伏的进程中有三次称得上“历史性巨大变化”,那就是结束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到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

称得上“历史性巨大变化”,当然不是什么孤立的事件。它总是中国社会和内外环境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产物,又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中国社会下一步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史学研究从来特别重视对过程的考察,既注意它的延续性,又注意它的阶段性,探索历史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努力对它的内在逻辑给予合理的说明。这个过程是复杂的,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充满矛盾中行进。辛亥革命80周年和90周年时举行的两次大型学术讨论会规定的主题:一次是“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一次是“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都意味着要具有更长远和宽广的眼光,把辛亥革命从整体上看作“近代中国”或“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大变动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来考察。

政治史同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这里涉及史学领域内议论得很多的政治史同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推翻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首先是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在历史发展中,经济是基础,思想文化往往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这

是没有疑问的,但政治事件对历史产生的巨大作用决不能被轻视。记得在一次南京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来自台北的张玉法教授在大会上有个发言,大意说:我是比较多研究政治史的,近年来政治史似乎不太吃香了,这次我提供的论文特地选择近代山东青岛工业的发展作为题目。但一研究起来,德占时期、中国收回后、日本占领时期、抗战胜利后,青岛的工业状况都显然不同。政治一变,经济跟着就变。政治一变,文化跟着也变。张先生这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事实确实是这样:八年抗日战争期间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同抗战爆发以前和以后显然不一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同它以前和以后显然也很不一样。因此,在史学领域内,对历次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包括对辛亥革命全过程的深入研究在内),始终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课题,为大众所关注,成为谈不尽的话题。这一点,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并不因为提倡重视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就可以忽视政治史的研究,在这方面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

但是,只注重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而忽视其他方面,确实远远不够。社会生活的内容太丰富了。它有许多侧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如果不能把重大政治事件同当时国内外环境和社会结构、民众心理嬗变的宏大背景联系起来考察,如果不能对导致政治事件发生的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作出深入的剖析,便不能对事件为什么会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有深刻的理解,对历史的叙述也不能更有血有肉。同样,辛亥革命那样的历史性巨大变化,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社会生活和民众思想的方方面面,对以后历史的发展产生长期和深刻的影响,这也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使人高兴的是,这个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史学工作者的重视,做出了不少成绩。许多文章,读后使人感到耳目一新,拓宽了视野,加深了对历史发展的理解。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资料通常还比较集中,而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嬗变的资料往往散见在浩如烟海的大量报刊、档案、文集、回忆史料中。陈垣先生以前说,研究古代史时对史料的掌

握要做到“竭泽而渔”。而从事近现代史研究时,面对的史料不是“泽”而是“海”,再勤奋的学者也往往有“望洋兴叹”之感。要从这样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清头绪,经过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再现出一幅当年社会状况和民众心理一步步嬗变的宏观图景,谈何容易。它需要时间,需要经历一个知识积累和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它的初期,出现“碎片化”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不能苛责。但这毕竟只是过程的起点,研究者心目中总还得悬着力求逐步还原宏观历史全貌的目标,怀着若干需要寻求答案的问题。问题越重要,越是更多人关心而又没有弄清,答案越能建立在扎实可靠的事实基础上,这种研究工作的成绩就越大。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正是在极细心考证的基础上,提纲挈领地说明唐代政治史中几个关键性问题。至今研究唐史的学者,谁也不能绕过它而前进。这才是大师风范,令人钦羨。从事某些个案的具体研究(特别是那种能够“从小见大”的个案研究)是很需要的,永远是史学领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如果太多人长期停留在这一步,或者过分热心于探讨一些很细小的问题,使它处于史学研究的主流地位,而不能使人从中感受到时代潮流脉搏的跳动,那确实也容易流于琐碎,脱离历史整体,造成“碎片化”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况;甚至会以偏概全,看起来引证了不少资料,其实却夸大了历史进程中一些次要的现象,对重大的历史问题得出未必正确的结论来。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不少。

要重视对“中间分子”等问题的研究

胡乔木和胡绳曾多次强调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时要重视“中间分子”的问题。事实上,在各个时期始终坚定地站在先进或反动立场的人终究是少数,中间分子却是多数。他们平时在政治上比较沉默,当历史大动荡时又容易摇摆不定。常常在革命高潮时左派多,革命低潮时右派多,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原是摇摆不定的中间分子。而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人心向

背大变动,很大程度上正是取决于这些人数众多的中间分子态度的变化。我们以往对人物研究的着重点常常只放在居于斗争双方前列的那些著名人物身上,而对相当程度上左右大局变动的中间分子思想变动状况谈得很少。研究重要时期的历史,如果对大多数人的生活处境和思想变动状况很少谈到,无论如何总是一个缺憾。这可能也是今后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这些“中间分子”看起来比较平凡,留下的记录比较少,但有心人如果选择他们中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的日记、书信、文集等作为典型剖析,加以综合,仍可得知大概。除了个人以外,各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在这个时期的状态和他们地位的升降变迁也是值得研究的。

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我们的史学论著中写得多的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高潮时的情况。高潮自然是重要的,值得重笔浓彩地写,但高潮并不是凭空发生的,而以往对它到来前如何一步步酝酿又并不那么显眼的变化注意得不够。拿五四运动为例,一般书籍和文章中对五月四日当天的集会、游行以至“火烧赵家楼”等情节都很详细的叙述,但对这以前人数众多的学生、市民的思想以至生活状况,他们对待巴黎和会问题的心理状态的逐步演变等讲得比较少,而高潮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些最初并不显眼的变化一步一步积累起来、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人们原来没有料想到的大爆发的。套用哲学语言来说:谈得多的是它发生质变时如何实现飞跃,而对导致这种质变的渐进的量变过程研究得不够。这同样是需要加强的。

还有一点,中国国土辽阔,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民众心理以至风俗习尚的差别很大。这些年来,对各省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状况已有不少研究论文或专著,这样的研究进一步做深做细还有不少空间,而对这些不同地区加以比较,分析它们各自的特点,再进行综合研究,更有许多工作要做。

※ ※ ※

总之,辛亥革命的研究远不是已经差不多了。这是一个富矿,有待进

一步发掘的矿藏还很多很多。至于我们这样年龄的史学工作者,可以说只是一些过渡阶段的人。要讨论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我们大概只能侧重于“回顾”,对“展望”虽然可以发表些感想,自己未必再能做多少事,这一切只能寄厚望于比我们年轻的史学工作者了。

序 言

朱宗震

辛亥革命的历史任务是什么？一般说来，就是救国，也就是反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反满，也就是反对封建帝制，争取民主共和。至于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政界都是稀里糊涂的事，更不必说普通的老百姓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制的民国，似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事实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没有获得政权，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中国则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历史的进程，并没有那么简单。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党人在思辨上有个误区，就是以为只要简单地引进西方体制，就可以完成中国社会王朝更替后的整合。其实，在这两个历史任务之间，是需要根本不同的社会动员的。他们发现了西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先进性，以为中国可以取法乎上，予以引进实现。同时，他们不理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非常顽强（尤其是官僚主义文化），要改造更新十分困难。他们从表面上观察清王朝，把清王朝和满族亲贵同中国的传统政治势力，视为一体。所以，在他们看来，清王朝——满族亲贵已经非常腐朽，推倒他们非常容易，也就是说实现民主共和也非常容易。在孙中山看来，在他执政后也只要九年的过渡，而在宋教仁看来，只要大家接受一部纸面的宪法，就可以运行。直到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在中国的官僚政治面前，非常软弱，没有社会改造的力量。广东都督陈炯明甚至承认由于自己没有力量，不能不向袁世凯投降。

值此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祭祀先烈，缅怀这场开拓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运动，总结经验教训。原来，先烈和后代都把中国传统的王朝更

替运动和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运动,混为一谈,因而没有厘清自己背负的严重的客观历史任务,他们遭到挫折和失败也就不奇怪了。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先烈们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牺牲,尽了开拓的责任。我们后人只有吸取经验教训,承担起更加努力前进的义务,而没有对先烈冷嘲热讽的权利。

王朝更替是中国的传统,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士大夫阶层在摧毁一个王朝的过程中,从来不担任急先锋的角色,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是由基层民众的造反来承担起这项任务。士大夫往往是参加一个集团,发挥整合的功能。发动辛亥革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群体,对摧毁一个王朝,社会分崩,群雄逐鹿,然后重建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的艰难过程,认识很模糊。而这是近代中国无可回避的传统历史任务。

他们是一批学习西学的先进分子、精英分子,他们自己承担的使命是要向西方学习,使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他们对西学的认识还很皮毛,对西学移植到中土需要的社会条件,还没有实践上的认识,因而在主观上觉得并不困难。直到前几年,还有一个中国“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了民主,什么社会都能治理良好,而不知道民主的实现和运作是有条件的。而且,中国懂得西学的人很少,所以劳乃宣说:中国“略晓欧美文明法律,具民主之见解者”,“极多万人耳”。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还缺乏人才储备。凡事都要人去做的,没有人才,那么重要的体制转型,由谁去实现呢?

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面临着两个基本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实现王朝更替、社会更新;第二个任务,就是向西方学习,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目标。这两个任务纠结在一起,使人理解不清。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党人看到了推翻一个王朝并不困难,但没有看到更新中国社会非常困难;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党人看到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和理论文化的先进性,但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落后的中国要吸纳西方先进的经验,需要创造条件并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同

时,辛亥年的那些年轻人,还不懂得中国强劲的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的独立性和独创性,这就使中国社会具备创造世界前所未有的新价值观的潜力,也使中国社会在吸纳西方文明方面有更大的阻力,也就是对异文化的排斥现象。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党人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代开拓者,他们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但他们为后人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中国的王朝更替运动进行了三十八年的残酷斗争,1949年革命完成了这一任务,国家重新进行了整合,建立起了强大有效的新政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崇尚大一统文明的社会来说,事实上,在国家重新整合以前,现代化的转型是很难真正启动的。即使国家整合完成之后,国家的整理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花费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只有在1978年之后,中国才真正走上了现代化发展和转型的道路,我们的积累还非常薄弱,问题随处可见。何况,中国只有走上独创性的道路,才有可能完成现代化,简单地学习西方从殖民时代开辟出来的现代化道路,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而且要为人类创造新文明。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

目 录

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金冲及 / 1

序言 朱宗震 / 1

第一章 革命的领袖、组织和行动 / 1

第一节 革命的领袖和起源——披荆斩棘的孤胆英雄孙中山 / 1

一、烈火的孕育 / 1

二、寂静中的惊雷 / 4

三、顽强的播火者 / 8

四、共和之魂 / 12

五、只手擎天 / 17

六、迎接国民革命风暴 / 21

第二节 革命的组织——中国同盟会 / 25

一、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革命活动 / 25

二、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 27

三、中国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 29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动员模式和用兵方略 / 33

一、辛亥革命的动员模式 / 33

二、辛亥革命的起兵方式	／ 44
第二章 民国初年共和制转型的探索(上)	
——议会制度的确定	／ 51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的上海和南京建都	／ 51
一、孙中山对建都的设想	／ 51
二、上海地区革命势力的集结	／ 52
三、革命中心的转移与建都南京	／ 55
四、北京和南京之争	／ 57
第二节 孙中山在开国问题上与章太炎的分歧	／ 60
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争	／ 60
二、关于民初政制之争	／ 64
第三节 宋教仁与民初政治	／ 66
一、法治范围内的同盟会改组	／ 66
二、对袁世凯违法活动的忍让	／ 72
三、民国初年法治的幻灭	／ 76
第四节 戴天仇和章行严的宪政分歧	／ 79
一、共和理论的阐述和客观政治形势的观察	／ 79
二、戴天仇激烈过当,章行严稳健有余	／ 81
三、章行严坐而论道,戴天仇主张革命	／ 86
第三章 民国初年共和制转型的探索(中)	
——和平建设	／ 93
第一节 孙中山民元开国的财政政策	／ 93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的外债政策	／ 93
二、南京临时政府时的财政措施	／ 97
三、建设民国的财政政策	／ 102
四、关于建国的财政政策的评价	／ 106

第二节 孙中山访问北京的心态 / 117

一、胜利者的心态 / 118

二、开拓者的心态 / 122

三、先进者的心态 / 126

第三节 程德全管辖江苏 / 133

一、江苏政局的统一 / 133

二、拥护中央与调和党争 / 140

第四节 安抚会党政策的失败 / 145

一、应桂馨创立共进会 / 145

二、共进会滋事问题的提出 / 146

三、程德全的安抚政策 / 149

四、江浙两省的政策分歧 / 151

五、袁世凯政府收买应桂馨 / 154

第四章 民国初年共和制转型的探索(下)

——再度革命 / 156

第一节 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案 / 156

一、宋教仁案的司法审判 / 156

二、善后大借款的成立和革命党人的对策 / 164

第二节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曲折过程 / 170

一、激烈派和稳健派的争论 / 171

二、“宋案”发生后的策略选择 / 173

三、二次革命发动的挫折 / 177

四、孙中山坚持动员革命 / 184

五、最后的动员 / 188

第三节 孙中山对民元国民党的抛弃和批评 / 193

一、民元国民党和同盟会的区别 / 194

- 二、孙中山对民元国民党的抛弃和批评 / 199
- 第四节 释陈其美 1915 年春致黄兴函 / 204
 - 一、孙黄分歧 / 204
 - 二、关于孙中山的策略 / 206
 - 三、反省失败教训 / 210
 - 四、力树孙中山权威 / 215
 - 五、陈其美之死 / 216

第五章 辛亥革命时的理论困境 / 223

- 第一节 革命党人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 / 223
 - 一、孙中山的思维 / 223
 - 二、黄兴的思维 / 229
 - 三、宋教仁、章行严的思维 / 232
- 第二节 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论和冒险精神 / 237
 - 一、“行易知难”和冒险精神的联动 / 238
 - 二、革命理想和社会基础 / 240
 - 三、实业建设和国内外环境 / 243
- 第三节 孙中山的伦理观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 / 248
 - 一、天下为公与无良心的资本家 / 248
 - 二、国有和民有的两难选择 / 251
 - 三、先知先觉和官僚资本 / 253
- 第四节 民国初年的权威主义 / 256
 - 一、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 256
 - 二、孙中山、梁启超、袁世凯的权威主义 / 266
 - 三、开明专制穷无所归 / 272

第一章 革命的领袖、组织和行动

第一节 革命的领袖和起源——披荆斩棘的孤胆英雄孙中山

一、烈火的孕育

俗话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实就像鸡生蛋,蛋生鸡这样一个往复循环的前进运动。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辩论,我们在此可以搁置不论。辛亥革命就是一位孤胆英雄孙中山单独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位孤胆英雄并不是无根之水,他作为时代的英雄,却是时势酝酿的产物。在那看不到现代光明的黑暗时代,也造成了孙中山只手擎天的个人英雄主义错觉。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创建中华民国的主要领袖。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谱名德明,幼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初字日新,后改逸仙。流亡国外期间,曾化名中山樵、高野长雄。革命者无意间称他为孙中山,民国后就成为社会上的习惯称呼。他自署本名孙文,英文名 Sun Yat-sen。

孙中山的故乡背山临海,土地贫瘠。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浩瀚的大海、葱郁的山林,并不能养育众多的人民,这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是一个贫苦的农民,经常用番薯糊口。孙中山幼年要上山打柴,牵牛放牧,生活艰辛而又单调闭塞。传统的祖先崇拜、神道设教、宗法统治,加上平庸的生活可以扼杀任何一个有天赋的精灵。

时代的剧变,颠倒了区域发展的序列,机会终于出现了。鸦片战争之